

唐音癸籤



1207.22/55

唐音癸載

〔明〕胡震亨著

上海古籍出版



20836635

836635



唐 音 哭 簿

〔明〕胡震亨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)

長者書在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2 字數 227,000

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1,500

統一書號：10186·252 定價：(六)0.99 元

前　　言

在明朝後期研究唐詩幾位成就較高的學者中，胡震亨可稱巨擘。他的貢獻遠在楊慎、王世貞兄弟乃至胡應麟之上，成績主要表現為一千多卷的鉅著《唐音統鑑》，其中尤以《唐音癸鑑》為突出。可是胡震亨的生平，《明史》無傳，又無行狀誌銘傳世。今日所憑藉者只有有關方志、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、胡氏所編各書題跋或他人序錄和胡夏客《谷水集》等。可惜的是胡震亨的《赤城山人稿》國內既無全帙，海外亦未見藏目。以我所見最多者僅上海圖書館藏明刊殘本九至十一共三卷，而其中第十、十一兩卷皆為《邑乘序說譜考文》，于生平行歷無關。今就各書鈎稽所得，略述其家世、生平、著述之大略，以供讀《唐音癸鑑》知人論世之一助。

—

胡震亨是浙江省海鹽縣城內虹橋里人〔一〕，先世幾代只有祖父有過功名，其餘多是布衣，教授里中。祖父胡憲仲，曾經受過著名學者鄭曉〔二〕的教育，嘉靖二十九年（一五五〇）中了進士，三十一年（一五五二）任南刑部主事，很有軍事政治等方面的才能，可惜到南京第二年就死了。父親胡彭述，喜歡讀書藏書，曾經把家中藏書編了個《好古堂書目》，在序裏說「予家世為

塾師」。他們的事蹟見於天啓刻本《海鹽縣圖經》十三、十四兩卷。胡震亨的好學是和家庭傳統分不開的。

胡震亨原字君鬯，取《周易·震》「震亨……震驚百里，不喪匕鬯」之義〔三〕；後改字孝轍，自號赤城山人，學者稱赤城先生〔四〕，晚年自號遜叟。方志除《海鹽續圖經》有赤城一號外，餘皆脫略「君鬯」、「赤城」字號，當補正。^{chunyang}

胡震亨生于明穆宗隆慶三年己巳（一五六九）。《讀書雜錄》卷上：「余生七歲，時爲萬曆之乙亥（三年，一五七五）」。胡夏客《李杜詩通》識語：「迄于壬午（崇禎十五年，一六四二），時年七十有四。」據以推知胡氏當生于此年。

《讀書雜錄》卷下記載了甲申（崇禎十七年，順治元年，一六四四）李自成破京師的事，又云：「今國家不幸，播遷江表，而立國之初，諸公討賊之義未伸，固圉之計總缺，日惟講門戶，援黨類，招貨賄，……」胡夏客《谷水集》卷七詩題有《甲申冬有從南都歸言近事者余賦此呈家君一噱》，可見胡尙及見福王弘光時事。胡夏客《李杜詩通》識語又稱：「旋遭改革，頻囑小子夏客藏稿本山寺，行遁不憚而卒。」按順治二年乙酉（一六四五）清兵南下，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皆在此年。夏客所謂「行遁不憚而卒」，則必死于避難途中。故定胡氏卒于此年。其生卒爲公元一五六九年至一六四五五年。

二

胡震亨十八歲中秀才，胡夏客《谷水集》、曾祖母仇夫人頌說：「問歲十八，榜名繩武。」二十九歲中了舉人，時為萬曆二十五年丁酉（一五九七）。後來連續多次考進士未中，《海鹽縣志》說他「數上公車不遇」。萬曆三十五年丁未（一六〇七）三十九歲，選授故城縣敎諭，這是胡氏歷官的開始。「故城」《嘉興府志》、《海鹽縣志》及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等書均誤為「固城」，當改正。《明史·地理志》無「固城縣」。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萬曆本《故城縣志卷二·敎諭》有如下記載：

「胡震亨，浙江海鹽縣人，由舉人萬曆三十五年任。博綜經史，富有詞章；文學可振一方，行誼足模多士。陸直隸合肥縣知縣。」

《故城縣志》未記胡氏離任之年，但記載了下一任教諭沈元昌為萬曆四十一年任。胡氏《留別甘陵諸生》詩有「一官五載瞥過眼」、「轉眼春風花又開」及「明年六傳選鄉士」的話。按萬曆四十年壬子恰逢鄉試之年，故胡氏任滿當在三十九年冬。按當時常例，一官滿任，赴吏部候銓，然後赴新任，約需一年多時間，故疑胡氏赴合肥知縣任約在萬曆四十一年（一六一三）。

終萬曆之世，合肥知縣共十一人，胡為第十任，在任五年，「治狀冠江北」。康熙本《廬州府志·卷二十四·名宦》記云：

「聰察若神。頑梗至前，一矚目，便能指數姓名。呂鳳糧僉民戶領價糴解，中產立盡。乃請爲官解，以丞、簿尉遞主之，而於糴價外量增耗羨。官民稱便。諸猾皆假近胥爲因緣，廉得其狀，痛榜之，曰：『某在治，有毒吾民者，載棺以俟。』」世家裔犯偷，資以錢米，卒爲良。善政甚多。任五載，遷守德州；以母老，告歸。」

五年合肥知縣，表現出胡震亨吏治的才能。特別是改革官糧運輸問題。《合肥縣志》卷三十五裏，還有胡震亨的《興革鉅務議》一文，詳細敘述改革的好處，後來上司采納了，而且「立石縣前，永爲奉行」。

萬曆四十六年胡震亨遷升爲德州知州，但他因爲母老沒有赴任。這一年遼東形勢緊急，朝廷起用老將劉綱。胡震亨出于愛國熱情，「馳謁論兵，老將心折」^(三)。這是胡震亨第一階段仕宦的概況。朱大啟在《李杜詩通序》裏說胡震亨：「起家孝廉，領州牧，方資揚歷，遽遂初衣，時時著書，斯以勤矣。」說明其後幾年，胡震亨都在辛勤著書。首先是和姚士粦同撰《海鹽縣圖經》，到天啟二年（一六二二）告成。

崇禎即位後幾年，朱大啟曾經向朝廷舉薦過胡震亨，但被別人破壞了。朱說：「會今天子詔訪古公卿各舉所知，儲文武兼才牧民御衆之選。余備員廷尉，職得薦吏，輒表副側席之求。時戎事孔殷，大司馬察茂才異等夙諳邊務者，將擢以不次。騎齡者顧尼之，不竟其用。」朱大啟所

謂備員廷尉，當卽指做刑部侍郎。按談遷《國榷》卷九十六，崇禎十年（一六三七）七月「刑部右侍郎朱大啟致仕」，舉薦胡震亨爲京官必在朱致仕之前。

崇禎十年起，胡震亨由于薦舉做了定州知州。乾隆元年《定州志》卷三《名宦》說：

「胡震亨，海鹽舉人，崇禎十年以薦舉知定州。在任廉明，惠政多端。嘗捐清俸三百金爲唐河橋購稻田三十八畝七分以供常年橋渡之費，至今賴之。其文詞古峭，亦擅名天下。」

《赤城山人稿》卷九有《井陘道兵憲蔡公衆春園嗣韓堂肖象碑記》一文，也明提「崇禎十年屬吏知定州胡震亨」，與《定州志》合。《定州志》未載胡震亨離任之年，《海鹽縣志》有「以城守功擢兵部職方司員外郎」的話。按《國榷》卷九十六崇禎十一年十一月「建虜犯定州」，這次清兵（卽建虜）大舉入侵，到第二年三月「凡破七十餘城，燐掠殺傷，不可勝計」，但定州未被攻破。陳光緯在《讀書雜錄序》裏隱約其辭說：「洎乎薦守中山，登陴九拒，書勳天府，入佐樞曹。」這和《海鹽縣志》的說法一致。究竟那一年離任，估計在十二年下半年。《定州志》卷九有胡震亨《陸公名宦祠記》。陸文衡是崇禎十二年四月就任，十三年臘月離任。胡在文中自稱「舊屬吏震亨」，可見胡的離任必在陸前。明末任定州知州者，胡氏之後尚有尚衍、唐鉉、張淑浚三人，胡氏任期不會太久。陳光緯《谷水集序》說胡夏客「自戊寅（崇禎十一年，一六三八）隨父仕中山，登陴墨守，決月而解嚴。踰年告歸，……」，亦可推想胡亦于十二年離定州。且十三年閏正月「命巡城

御史煮粥賑饑，發帑八千金賑真定」^(六)，胡震亨是良吏，有經濟才，如果十二年秋大災荒仍在定州，則必有善政可紀。《定州志》僅記修橋一事，可知秋後已擢升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了。

胡震亨做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的時間不長，胡夏客《敍感》詩說：「樞曹當借才，諸公與先後。危言曾痛哭，任事終引肘。」陳光緯說：「限于資格，未盡展其用。」就是說別人忌妒他，用資格做借口來加以阻撓，依照康熙二十一年《嘉興府志》的說法，是跟當時的兵部尙書陳新甲合不來而告老，他大概就結束了仕宦生涯。朱大啟說：「胡子以其才浮沉于世，亦足身致高位。遭時陷假，如檼摧牙折，不求更張，偃息林谷，託意于諷采。」^(七)《海鹽縣志》說：「乞歸，藏書萬卷，日夕搜討。」朱大啟在崇禎十年七月致仕，胡震亨後來請他寫《李杜詩通序》，朱在序裏說：「先，余亦懸車歸老，山居多暇，每有揚榷，時過從相歡甚。」可見兩人晚年的交誼。朱大啟《曼寄軒集》國內外也未見藏目，至爲可惜。朱大啟卒于崇禎十五年六月^(八)，序文必寫定在前。胡震亨任兵部職方司員外郎時間雖短，但這是他一生最高的官職，所以後人稱他爲「胡職方」，以致他的孫子成之、曾孫頤在《刻戊籤緣》後還用一方「郎官後裔」的圖章。

三

海鹽一帶曾經是明清兩代文士薈萃之區。張元濟先生曾稱胡震亨是「吾邑第一讀書種

子」。的確，胡震亨是嗜書如命的。他自己說：「余自幼好讀書，老而念歲月無幾，嗜讀尤勤。每披卷，惟恐客至，妨吾所事也。」〔九〕陳光緯在《讀書雜錄序》裏說：「余聞公少時與劉少彝、姚叔祥諸君子析疑賞異，以夜漏四下爲率。詰旦必舉所聞以參考焉。」由于勤奮苦讀而又家藏萬卷，加上姚士粦和劉世教（胡的舅父）也都富有藏庋，所以胡氏涉獵極廣。他和明末大藏書家、刻書家汲古閣主人毛晉又是極好的朋友，他刻的《秘冊彙函》就是和毛晉一同校刊的。《海鹽縣志》說：「凡海虞毛氏書，多震亨所編定也。」證之以《津逮秘書》、《宋六十名家詞》等汲古閣很多大部頭書，都有胡震亨的題跋，《海鹽縣志》的話是可信的。這些都是胡氏多讀異書的條件。胡震亨的著述見於《明史·藝文志》的計有：

《靖康盜鑑錄》一卷（史部·雜史類）

《讀書雜錄》三卷（子部·小說類，按原書實只上下二卷，有康熙刻本，又見于《豫恕堂叢書》、《明志》訛。）

《秘冊彙函》二十卷（子部·類書類）

《續文選》十四卷（集部·總集類）

《唐音統籤》一千二十四卷（同上。按：《統籤》甲至壬爲一千卷，《癸籤》三十三卷，合一千〇三十三

卷。《明志》總數既訛，又以《癸籤》爲三十六卷，亦非是。）

單看《明志》著錄的，已可謂著作等身了。《四庫全書總目·史部·地理類存目》尚有《海鹽

縣圖經》十六卷。以余所見，尚有《通考纂》二十四卷，《李詩通》二十一卷，《杜詩通》四十卷，《赤城山人稿》等，《明志》皆漏略。

陳光緯在《讀書雜錄序》裏，列舉胡氏著述之富，有如下一段話：

「故公著述最富，非獨《赤城山人集》摛藻如淵、雲而已。其經世之學，則有《通考纂》；其啟集林之秘，則有《續文選》；其衷輯乎詩苑，則有《唐音統籤》；其預知綏寇之充斥也，則有《靖康盜鑑錄》；其媲美乎《華陽國誌》、《吳地記》者，則有《海鹽圖經》；其博綜乎小說家，則有《秘冊彙函》（按：《秘冊彙函》首列《易解》及《嚴君平道德指歸論》爲經，子兩部，陳氏概入於小說家，不如《明志》列之類書爲確）。今誦是編，殆又嗣《秘冊》而抒奇麗者耶？」

陳光緯是胡震亨兒子夏客的學生，少時曾經從胡震亨問過業，「百問百應」，對胡震亨的博聞彊記，十分景仰。這一段話，不但看出胡的著述之富，而且看出方面之廣。當然，在胡的所有著述中，《唐音統籤》應是最重的。《統籤》以十干爲紀，甲至壬純粹輯錄唐詩，略加評介，而《癸籤》則爲研究心得的總彙，所以尤爲重要，首先有單刻本。《統籤》因卷帙浩繁，人間罕覩，博學如王士禎亦未寓目。王士禎《分甘餘話》卷四說：

「海鹽胡震亨《唐音統籤》，自甲至癸，凡千餘卷。卷帙浩汗，久未板行。余僅見其《癸籤》一部耳。康熙四十四年，上命購其全書，令織造府兼理鹽課通政使曹寅鳩工刻于廣陵。胡氏遺書，幸不湮沒。」

然板藏內府，人間亦無從而見之也。」

王氏此言雖爲一些方志所引用，而實爲誤記。曹寅所刻爲《全唐詩》，《統籤》迄無全刻。今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有《統籤》全帙，甲、乙、戊、癸四籤爲刻本，丙、丁兩籤刻而未全，其餘均爲范文若鈔配本。

四

《唐音癸籤》是胡震亨研究唐詩心得的結晶。胡夏客說：「先大夫孝轅府君搜集唐音，結習自少。至乙丑歲（天啟五年，一六二五）始克發凡定例，撰《統籤》一千卷。閱十年，書成。」〔1〕可見用力之勤。《統籤》的命名，據楊慎的解釋是：

「唐開元間列經、史、子、集爲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科，科各置牙籤，殊以色。明之季，有海鹽胡孝轅先生，學貫羣書，倣其意而彙全唐三百年詩，次爲一編，若初，若盛，若中，若晚，亦籤區之，戊籤其晚唐也。晚唐曷爲乎戊籤？甲以帝王詩，而後初、盛、中以次相及也。戊以下無詩乎？有己、庚、辛、壬矣。己、庚、辛、壬非唐人詩乎？唐人之不足名家並不足名詩，與異乎人之人，更兼夫非人之族之詩也。然則癸其遺乎？是用采古今之詩話、詩史，時參以己見，爲之殿也。」〔2〕

《統籤》的前九籤純粹輯錄詩作，間加評駁。當時搜集之功至鉅，後來康熙朝刊《全唐詩》，

即以季振宜《全唐詩》和胡氏《統籤》為主要依據。有了《全唐詩》，前九籤的重要性略為減色，而于《唐音癸籤》的價值，絕無影響。

《癸籤》共三十三卷，計分：卷一為體凡，言詩之體裁變遷及聲病等。卷二至四為法徵。其中卷二為統論，主要言詩歌創作的比興體格等各種體裁都必須運用的表現原則；卷三就各種體裁加以論述；卷四專談字句、偶對、用事等利弊。卷五至十一為評彙，按時代、體裁、題材等幾方面評論唐代著名的詩人和詩作。卷十二至十五為樂通，專談詩和樂曲、舞曲等的種種關係。卷十六至二十四為詁箋，專門解決唐詩詞語典故等疑難問題。卷二十五至二十九為談叢，專談唐詩人的遺聞軼事（按：《學海類編》收有單刻本，僅十數字小異）。卷三十至三十三為集錄，其中卷三十為別集，三十一為選集，三十二為詩話，最後一卷則為墨蹟和金石刻。

單看這三十三卷的目錄，已可以謂之體大思精。它涉及唐詩的各個方面。清人章學誠對「詩話」曾經這樣說：

「唐人詩話，初本論詩，自孟棨《本事詩》出亦本詩小序，乃使人知國史敍詩之意，而好事者踵而廣之，則詩話而通于史部之傳記矣。間或詮釋名物，則詩話而通于經部之小學矣爾雅訓詁類也。或泛述聞見，則詩話而通于子部之雜家矣此二條，宋人以後較多。雖書旨不一其端，而大略不出論辭論事推作者之志，期于詩教有益而已矣。」〔二三〕

《唐音癸籤》除包括章氏所談內容外，還涉及目錄版本金石之學，從詩話說，內容可謂廣博。在指導思想上，他堅持「聲音之道與政通」的觀念，認為詩歌與社會政治、習俗、士風有密切關係。在《法徵》裏他就引用「詩發乎情止乎禮義」的話作為一篇大旨。

胡震亨是以經濟自負的人，很有用世之心，但是明朝末年政權落在宦官手裏，和唐末的情況，頗為相似。科舉制度，弊端百出，讀書人為了做官，廉恥喪盡。胡震亨不肯從俗浮沉以求高官厚祿，退而著書，也不能忘情當世，在《唐音癸籤》裏常常借古諷今，抨擊當時的士風習俗。試就卷二十六裏略舉一二：

「晚唐人集，多是未第前詩，其中非自敍無援之苦，即贊他人成事之由。名場中鑽營惡態，忮憤俗情，一無不寫盡。」

「唐士子應舉，多偏謁藩鎮州郡丐脂潤，至受厭薄不辭。如平會『三縑卹旅途』之恨，張汾『一千貫出往還』之誇，鄙穢種種。至所干投行卷，半屬調辭，概出覆刪，若小說所稱『百錢買自書鋪』、『並荆南表丈一時乞取』者，真堪令人捧腹。士風凌夷至此，總科舉爲之流弊也。」

「進士科初采名望，後滋請託，至標榜與請託爭途，朋甲共要津分柄，如所云『欲得命通，問瑋、嶃、都、雍』等諺，更可駭詫矣。嗚呼，今日得無類之！」

我們還可從《讀書雜錄》卷下裏抄出一段來相印證。

「崇禎癸未（一六四三）值大兵深入，計偕者多中途狼狽而返……未幾兵退。八月補試，諸得第者至明年甲申三月李寇兵破京師，盡乞降僞職，殊少殉節之人，狗彘不若矣。嗚呼，國家以甲科取士，號爲第一等人物，而收效乃爾！原其讀書應舉初，早自算盡便宜，只顧身家，不顧朝廷故也。記唐末黃寇逼潼關，士子應舉者，方流連曲中以待期，爲詩云：『與君同訪洞中仙，新月如眉拂戶前。領取嫦娥攀桂桂，更從陵谷一時還。』士人不知好歹，胡說至此，科舉何益人國！欲倚之得人，冀有少分濟裨耶？」

胡震亨對黃巢、李自成等農民領袖的態度是錯誤的，這反映出他的地主階級立場的局限性。而他對於當時士風的抨擊，却是一針見血。明朝末年，政由閹宦，達官權貴，媢阿取容，不恤國事，內憂外患，風雨飄搖。胡震亨目擊心傷，在本書卷二十六中，借談唐詩，連及時事，如：

「一出縱知邊上事，舉朝誰信語堪聽？」此李涉連雲堡詩也。邊上事，做不得，說不得，今古一揆。」

「杜詩云：『任轉江淮粟，休添苑囿兵。由來貔虎士，不滿鳳凰城。』最曠天下大計矣。人主守在四夷，區區添兵京城，足救緩急乎？」

「稼人可畏，主兵柄尤可畏。唐人諷切及此輩者，自況之。『國詩居易之《司天臺》歌，李商隱之《有感》二律外，無聞焉。即其詩旨，亦靡弗譎而晦也。使天下不敢言，而猶欲恃之以保危祚，何怪乎終爲令孜諸奴所誤哉？」

「世多以歐後鄭五爲笑柄，鄭五未可笑也。渠嘗有詩題中書堂云：『側坡蛆蠅蠅，蟻子競來拖。一朝白

雨中，無鈍無嘆囁。」言國運且衰，旦夕有愚智同盡之禍也。若今人處此，則一切諱言矣。」

就對詩歌的理解欣賞和創作來看，胡震享用的仍然是《孟子》「知人論世」、「以意逆志」和前人評杜詩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的觀點。他認為首先要重人品，那些交結重臣的詩僧，「品格斯非，詩教何取？」不值一談。而對忠義之士如司空圖、韓偓等，則說：「此等吟人，未論工拙，要為無負昭陵。」他對於詩歌理解的獨創性見解，主要表現在《李杜詩通》裏，朱大啟序列舉了一些突出的例子。本書的《法微》、《評彙》、《詁箋》及《談叢》幾部分中，也時有表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雖然對王世貞兄弟和胡應麟的詩歌主張很佩服，但能自出手眼，不是一味盲從。他認為李、杜兩大家的風格不同，因此讀法也應有區別。他說：

「夫白亦詩酒自娛，跌宕一生者耳，安能顧語忌，拘教義，爲是屑屑者哉？詩人各自寫一性情，各自成一品局，固不得取錦袍豪翰，強繩以瘦笠苦藻，必同篇吹爲善也。」〔三〕

「凡詩，一人有一人本色。」〔四〕

「且讀白詩，與讀杜詩自各一法，舍旃白詩中靈筆妙趣，顧作詩時日是求，何爲？曾雖號爲文章大家，

吾未敢謹之。」〔五〕

他認為選詩也應該注意時代特點，反對只取形式的模襲。他批評高廷禮《唐詩品彙》「大謬在選中，晚必繩以盛唐格調，概取其膚立僅似之篇，而晚末人真正本色，一無所收」。〔六〕

他強調讀書還要有實際觀察，曾借姚叔祥和自己的經驗提出反問說：「人足跡不出門，能悉門外許許，盡拈爲錦囊用乎？」〔古〕

諸如以上各點，今日看來，還可算是不刊之論。

五

胡氏此書博稽羣集，成一家言，三十三卷部帙井然，綱舉目張，可謂體大思精。然亦有可指摘者：引用他書，漫無體例，或居條目之前，或注條目之後；或舉書名，或稱字號，如王世貞或稱《藝苑卮言》，或稱元美、弇州、長公等。推原其始，或由展轉引用，隨手編錄，未能畫一，其可譏者一。

更有甚者，計有功《唐詩紀事》採錄唐人選本如《河岳英靈集》、《中興間氣集》及說部諸書，時就行文有所刪改，不盡忠于原作。明人引書，尤多逞臆改竄，胡氏曾批評楊慎「搜隱摘奇，往往任胸援引，非必盡確」〔古〕，而胡氏亦自蹈此轍。所引各書，經細校原本，則改動者十七八，照錄者十二三，剪裁顛倒，屢見不鮮；甚或斷章取義，錯會原意，展轉引用，以甲爲乙。若有改必錄，則篇幅將半於全書，流爲繁瑣。今僅就其影響較大或與原書意有出入者作爲校記，分附各卷。現引用數條，以見一斑。